

嵌入、脱嵌到再嵌:职业教育吸引力下降的制度根源及重塑路径

郝天聪 汪卫平

[摘要] 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下降并非是一个旧问题,而是一个新问题。借助个体化理论视角,通过对老中专生回忆录文章的文本分析和新中专生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中专生社会形象的变迁伴随着其从“嵌入”到“脱嵌”的个体化进程,即从“精英教育体制下的学业佼佼者”转变为“精英教育体制瓦解下的学业失败者”,从“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渴望‘跳出农门’的农家子弟”转变为“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瓦解下渴望融入城市的新市民子弟”,从“就业包分配体制下的‘铁饭碗’获得者”转变为“就业包分配体制瓦解下的‘打工一族’”。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以中专生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学生个体化发展并未实现有效的制度“再嵌”,这是造成职业教育吸引力下降的根本原因。为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需要强化与职业教育学生个体化发展相匹配的制度建设。一是改革单一以分数为取向的普职分流制度,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教育类型;二是夯实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凸显高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技能优势;三是完善职业教育升学体系,健全技能型人才评价制度。

[关键词] 职业教育;吸引力;个体化;嵌入;脱嵌;再嵌

一、问题提出

回溯历史,职业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政策文件。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即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22年,为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时隔26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目前,我国初步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即在学制层面初步建立起与普通教育等值互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然而,在学制层面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却并不一定带来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显著提高。^①与政策层面的高度重视相比,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在现实层面却遭遇认同危机,吸引力明显不足。在中等教育分流过程中“普热职冷”的现象比比皆是,普职大体相当政策也日

郝天聪,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南京210097);汪卫平,管理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院研究员、讲师(杭州311121)。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职业发展视角下高职院校教师企业精准实践研究”(BJA220244)的阶段性成果。

^①郝天聪:《职业教育何以成为类型教育——基于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建设的观察》,《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4期。

益受到质疑,甚至有观点呼吁在高中阶段教育中取消职业教育。

然而,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其经济社会发展终归要靠人,要靠人的能力和素质的不断提高,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以及各行各业高素质的劳动者需要通过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有针对性地被培养,比如技能人才需要职业教育来培养,依旧是当今社会一种普遍而有效的规律。^①也有学者指出,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我国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宏伟蓝图,技能型社会建设需要职业教育在其中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尤其是推动技能人才供给与现代化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高度匹配,最终将助力我国跨入技能强国之列。^②

为扭转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利局面、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明确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定位仍旧任重道远。现有研究多从当下出发,宽泛地探讨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可能原因,并提出应对之策。有学者提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缺失,既有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也有职业教育自身因素和人才评价、任用机制的影响。^③也有学者提出,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过程中存在尚未形成合力、教学体系不完善、服务能力不足等现实难题。^④上述研究对于解释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问题具有一定启示,但难免存在就事论事的嫌疑,缺乏理论层面的深度思考,也忽视了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形成的历时性过程。

实际上,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变化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所处理的问题关乎人生,关乎历史,也关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相互交织,要想充分说清我们时代面临的问题,就不能不坚持贯彻历史是社会研究的抓手的观点,既要接社会学的地气,又要有历史学的关联。^⑤

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当下的思考,难免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理解,缺乏对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问题的本质认识。如果我们真想知道所看见一切的起源,就必须研究“大历史”(Macro-history)。^⑥作为“大历史”概念的重要提出者,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将“大历史”解释为,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至中国历史研究里去。^⑦“大历史”主张从长时段、整体上、纵深角度观察历史。

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借助“大历史”思维,基于个体化理论视角搭建分析框架,并从三个方面予以突破。一是突破“此时此地”的局限,“拉长”历史的视界,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审视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变化。二是秉持“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放宽”历史的视界,站在经济社会整体变迁的高度上审视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变化。三是遵循“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规律,“加深”历史的视界,通过对中专生社会形象变迁这一现象的梳理,厘清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的本质,并为明确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为避免泛泛而谈,针对拟要解决的研究问题,本文以中专生为经验研究对象,为解释职业教育吸

①庄西真:《长话短说:2009—2019年的职教观察》,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68—369页。

②石伟平、郝天聪:《职业教育如何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黄炎培职教思想的当代启示》,《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

③唐瑾:《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缺失及其提升路径》,《湖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④郭英茜、李妍:《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与吸引力》,《人民论坛》2024年第14期。

⑤[美]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

⑥[荷]弗雷德·斯皮尔:《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张井梅、王利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页。

⑦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页。

引力不足问题提供实证依据。中专全称为“中等专业学校”,是一个富有时代感的称谓。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类型,中专教育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时代变迁可谓是职业教育剧变的“缩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中等专业技术人才提出了大量需求。然而,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在当时极为有限,所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彼时,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国家在“一五”计划启动时发出全面学习苏联的号召,教育领域也同样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并从苏联引进了中专教育这种具有“短平快”特点的教育形式,初中毕业生接受3—4年的中专教育,毕业后即可分配到工作岗位,中专生为各行各业的复苏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技术和产品的更新,中专教育的地位有了变化,但培养工作第一线的技术员一类人才的功能是稳定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的时候。^①“文革”时期,中专教育体系受到严重破坏,进入发展低谷。改革开放后,国家重新确立了中专在培养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中的重要价值。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明确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扭转当时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随后,中专教育的办学规模长期处于较为稳定的水平。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专包分配制度的废除、高校扩招政策的施行,中专办学规模开始连年下滑。2000年,随着最后一批包分配中专生的毕业,标志着老中专时代的落幕。世纪之交可看作是中专发展的重要分水岭,以2000年为时间节点,大体上可以将中专生划分为老中专生和新中专生两个群体。新世纪前几年,中专发展陷入低谷状态。随着一系列国家政策文件的出台,中专曾经历过短暂的复苏。但到2012年以后,中专办学规模的萎缩趋势又不断加剧,其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也不断受到质疑。

中专教育可能是我国教育扩张发生以来,价值落差最大的一种教育形式,作为一种中等职业教育,中专教育虽有一个良好开端,却也难逃“非主流”的命运。它从兴办之初高高在上的地位转变到如今无人问津的局面,其间经历的大起大落集中体现了我国教育快速扩张过程中,职业教育的落寞和无奈。^②伴随着中专教育事业发展的跌宕起伏,中专生的社会形象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是中专生,新中专生的社会形象与老中专生相去甚远,社会地位与社会评价也存在重要差异。相比“天之骄子”式的老中专生,新中专生被贴上更多“后进生”“差生”“前途不佳者”等标签,甚至形成刻板印象。中专生的社会形象也从以正面为主逐渐转变为以负面为主,甚至达到“污名化”的程度。如“升学失败”下的工具性污名、“文化偏离”下的符号性污名。^③中专生社会形象的滑坡,不仅对该群体带来了直接的消极影响,而且影响到社会大众对中专教育的认可度,家长及学生群体不再如以往那样主动选择中专教育,中专教育的吸引力也由此不断降低。

回溯中专生社会形象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变迁历程,不仅有助于找到形塑中专生社会形象的关键要素,而且可以为当代重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提供重要参考,这也正是本研究的价值所在。此外,相关研究亦缺乏对新老中专生社会形象的对比分析,导致无法找到影响中专生社会形象的症结所在,以致无法对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下降问题做出有理有据的解释,而这也将成为本研究的着力点与突破口。

(二) 理论视角

针对拟要解决的研究问题,本研究拟采用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的理论视角。个体化理论发

^①杨仲雄:《中专面临大分化——中专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了什么》,《职业技术教育》2000年第24期。

^②刘精明、张丽:《教育的职场价值与教育不平等——中专与普通高中之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的对比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③杨金土:《在改革中稳定和发展中专教育》,《中国高等教育》1992年第21期。

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欧,描述了西欧社会一系列复杂的现代化现象,代表人物包括齐格蒙特·鲍曼(Z. Bauman)、乌尔里希·贝克(U. Beck)等。个体化理论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界对现代性的讨论而产生的,该理论强调,个体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得到不断彰显。个体化强调“自己的活法”。^①个体化表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转型。^②这种转型意味着,现代性的自我激化使个人从家庭、亲属关系、性别、阶级等工业社会中涵盖一切的社会范畴中脱离出来,并作为风险社会中社会性的再生产单位而出现。^③

贝克区分了个体化的三个基本维度:一是解放的维度,即从历史规定的传统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二是脱魅的维度,即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三是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④总体来看,前两种维度聚焦于去传统化与脱嵌,后一种维度聚焦于制度化与再嵌,表明个体化包含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个体化使得个体从传统的社会制度体系中挣脱出来,获得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但个体化同样也面临着风险。个体虽然可以做出自主选择,但是他们生活中的机会仍旧是高度结构化以及可预测的。^⑤换言之,个体化存在自由与解放的限度,如果个体无法实现对新的社会秩序的再嵌入,很有可能带来自我迷失。

现有对于个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而对于中国个体化的研究仍然较少。实际上,阎云翔提出,中国也同样经历着个体化的转型阶段。然而,与西欧不同的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力量是个体化的推动者。^⑥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个体选择问题,而更多的是制度变迁的结果。^⑦

本研究借鉴贝克关于个体化理论的分析框架,以中专生的个体化进程为切入点,以期透视中专生在个体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进而为解释职业教育吸引力下降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基础。从个体化的角度来看,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中专生经历了从“嵌入”到“脱嵌”的个体化进程,而从“脱嵌”到“再嵌”的个体化进程尚未真正完成。“嵌入”指的是,中专生具有较低的自主性,其职业教育选择深深嵌入国家各项制度体系之中,服从于国家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整体制度安排。“脱嵌”指的是,中专生开始具有更多自主选择权利,从传统的国家制度体系中逐渐脱离出来,其职业教育选择不再受到既定历史身份、支持系统与社会义务的束缚等。“再嵌”指的是,在高度制度化与可预测的社会机会面前,中专生不可能独善其身,需要融入新的社会秩序之中。

中专生的个体化变迁历程,一方面意味着,中专生逐渐摆脱了传统制度框架的约束,积极探索“自己的活法”,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与诉求,为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专生由于失去了传统制度框架所带来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使得个体的职业教育选择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进而带来潜在的风险。如果无法实现对新社会秩序的“再嵌”,中专生的个体化进程很有可能陷入困境,进而带来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下降。由此,破解以中专生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学生在个体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帮助其融入新的社会秩序,就变得尤为迫切。

(三) 研究方法

为对新老中专生的社会形象展开历时性分析,本研究主要借助内容分析法和访谈法搜集了相关

①阎云翔:《“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中国个体化命题本土化再思考》,《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

②U.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 127.

③U.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p. 90.

④[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⑤A. Furlong & F. Cartmel, *Young People and Social Change: Individualization and Risk in Late Moderni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⑥D. Davis & S. Harrell,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⑦Y. Yan, “The Chinese path to individual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1, No. 3, 2010, pp. 489 – 512.

数据。数据来源包括两部分。一方面,对微信公众号关于老中专生回忆录的文章进行遴选整理,进而分析作为当事人的老中专生对其当时社会形象的理解。以“老中专”“中专生”“新式中专生”等为关键词,在微信公众号“文章”栏目展开检索,通过主题筛选、数据清理,共整理出 18 篇有代表性的回忆录文章,标题如《致敬芳华已逝的老一代中专生》《当年的中专生,那都是人中龙凤》《一代中专生的峥嵘岁月》《老中专生们的历史天问:喜与忧》《老中专生:跳过了农门,却没能越过龙门》等。另一方面,通过深入访谈当代中专生,搜集到大量一手资料,来了解新中专生对其社会形象的认知。本研究走访了 3 所有代表性的中等专业学校,访谈了 24 位新中专生,学生专业背景涉及财务会计、国际经济与贸易、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等,覆盖了中专教育主要专业大类。根据前期编制的访谈提纲,本研究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进入现场。在正式访谈之前,本研究向访谈对象陈述了访谈的匿名性与主要目的,并在征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录音。由于访谈时间的有限性,面对面访谈持续的时间在 10—30 分钟之间。

在数据分析方面,本研究借助 NVivo 11 Plus 软件分别对微信公众号文章和访谈资料进行了编码分析。在微信公众号文章编码方面,由于分析的研究对象为老中专生,因此将老中专生编码为 L,将文章按照顺序编码为英文大写字母。例如,L-A 表示第一篇老中专生的回忆录文章。在深度访谈资料的编码方面,由于分析的研究对象为新中专生,因此将新中专生编码为 X,将中等专业学校编码为英文小写字母,将具体的受访新中专生按照顺序编码为阿拉伯数字。例如,X-a-1 表示在 a 中等专业学校访谈到的第一位新中专生。

三、从嵌入到脱嵌:中专生个体化进程中的社会形象变迁

借助个体化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通过编码分析与主题聚焦,本研究发现,关于新老中专生社会形象的描述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谁来读中专”,即中专的主要招生对象是谁,该群体的学业水平如何。二是“他们来自哪里”,即中专生的家庭背景如何,在家庭背景的作用下,他们对于报考中专有何种期待。三是“他们去往何处”,即中专生的职业发展状况如何,中专生的职业发展是否存在不同时期存在显著差异。

(一) 老中专生的社会形象

1. 谁来读中专:精英教育体制下的学业佼佼者

从老中专的招生对象来看,普遍是学业佼佼者,学业水平在同龄人中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改革开放之初,中专甚至可以与大学齐名,中专与大学是分别进行招生考试的,统称为“大中专院校”。起初,大中专院校只招收高中毕业生。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缓解各行各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中专开始招收初中毕业生,并逐渐由中等师范学校拓展到工商财、农林水、医卫等行业领域。自此,中专开始同时招收初中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前者被称为“小中专”,后者被称为“大中专”。彼时,由于教育资源总体较为有限,整个教育体系的精英教育色彩较为浓厚。有老中专生如此回忆道:

从教师到学校,方方面面的资源都很少,所以导致升学很难;国家选拔人才的总体思路,走的是精英路线,能被选拔出来读中专、大专、本科的,往往都是经历了非常激烈的竞争,从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而走过了独木桥的人才,往往都是一些精英。(L-D)

在精英教育背景下,中专招生名额受到严格的限制。相比大中专,小中专的报考难度更大、竞争也尤为激烈。对此,有老中专生回忆道:

当时初中毕业报考中专要进行预考筛选,名列前茅的才有资格考中专,各个学校成绩排前 20 名

的基本都去读中专了,而中师因为是师范类,又有更严格的要求,可以说,能进入中师的,几乎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考入师范后,为了适应小学教育,要求全面发展,对音体美都进行强化训练。(L-A)

上述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业优秀的生源大部分会优先选择读中专,而非读普通高中,优质生源也为中专积极社会形象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如果有哪家孩子考上中专,甚至会出现全村道贺、放鞭炮、放电影等景象,由此可见中专生的社会地位之高。

2. 他们来自哪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渴望“跳出农门”的农家子弟

在改革开放之初,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极大,加之我国施行的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的差距也很明显。当时的社会只有两个大的阶层: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相比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中专教育在当时的定位即为培养国家干部,能够转户口、包分配、吃国家粮。对于农村家庭而言,考上中专后身份也将发生重要变化,诱惑力极大。对此,有老中专生回忆道:

也许,当年我父母在我耳边说过无数次的话,也能够代表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的心声和期盼:只要能转商品粮,分配到咱们村来工作也行!而只要考上中专,就变成了非农业户口,国家就统一安排工作,可以让自己一步跨入另一个阶层,这对很多农民家庭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诱惑。(L-E)

而且,为了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国家给予了大量的补贴,大大减轻了农村家庭学生的负担。有老中专生回忆道:

中专生去上学不需要学费,在学校吃饭,住宿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国家还补贴生活费,许多中专生甚至可以省吃俭用一点,每月将一部分生活费寄回家中做补贴,还有许多国家奖学金,那时候的中专生在任何人眼里都是天之骄子,毕竟上学赚钱还可以补贴家用,在那个年代是多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啊。(L-O)

在那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时代,读中专是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首选,中专生身份所带来的不只是一纸学历,而是整个家庭命运的改变。对此,有老中专生回忆道: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人生较大的跨越。即使以今天的视角审视,也是如此。他们比父辈的社会地位更高,给孩子提供了更好的教育资源,通过渐进的方式向上流动。(L-Q)

3. 他们去往何处:就业包分配体制下的“铁饭碗”获得者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无论是产业的发展,还是职业教育的发展,都具有较强的“计划”属性,接受政府的统筹管理。彼时,中等专业学校主要由行业主管部门主办。行业主管部门同时管理相关企业,由于良好产教关系的存在,所以学生从实习到就业都较为顺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在1951年开始实行中专生毕业包分配制度。彼时,私有企业被国有企业取代,政府成为实际上最大的雇主。所谓就业包分配制度,就是由政府根据单位用人需求为毕业生派遣工作,毕业生没有机会到劳动力市场自主求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包分配制度发挥了统筹人力资源、协调地区利益的重要作用,保证各地区各行各业都能拥有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更为重要的是,中专生能够通过就业包分配制度进入体制内工作,获得“铁饭碗”。铁饭碗往往意味着较好的福利待遇(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较低的失业风险等。对此,有老中专生回忆道:

中专生就是时代精英的代名词,因为那时候国家对于中专生是包分配工作的,考上就是铁饭碗,是无数初中生争夺的焦点。(L-A)

此外,相比读大学的不确定性,中专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善农村家庭

的经济状况,而且由于就业比较稳定,其经济回报具有较强的可预期性与持续性。有老中专生回忆道:

30年前家长的观念就是学生早点工作,早点就业,读中专18岁就可以工作了。要是上高中,需要上三年高中,三年大专,考上本科要上四年。多数家庭供不起,学生读不起,也等不及这漫长的回馈过程。(L-C)

(二) 新中专生的社会形象

1. 谁来读中专:精英教育体制瓦解下的学业失败者

新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传统精英教育体制开始瓦解,学生开始更倾向于就读普通高中,进而获得更多升入大学的机会。与此同时,中专的吸引力不断下降,其地位从原来的重点高中之上逐渐沦落为普通高中之下。中专的学历教育优势逐渐丧失,而职业属性逐渐增强,成为包括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在内的中等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招生制度而言,中专的招生分数不断下滑,逐渐从选拔式教育变成兜底式教育,“差生去的地方”逐渐成为中专的新标签,中专的招生规模也在新世纪初陷入低谷。新中专生更多地被定义为学业失败者,读中专大多被视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当被问到“为何会选择来读中专”时,有受访新中专生坦言:“是因为考不上好高中,所以才来读的中专。我的成绩只能读一个很差的中学,再加上我的数学成绩不太好。还有就是我觉得读中专也可以发展得很好。”(X-c-2)而且,相比读普通高中,读中专在父母和朋友看来,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当被问到“你的父母如何看待你在中专上学这件事情”时,有受访新中专生如此回答道:“我感觉他们还是比较伤心了吧。因为我一开始进初中,表现都非常好。但最后去了中专里面。然后他们最不希望的是我到中专里面。我这个人自尊心比较强,朋友的话基本上没怎么说。我唯一特别要好的朋友,我和他说过这件事。”(X-a-3)此外,新中专生为避免尴尬,通常不愿跟别人主动提及在中专就读的事情。当被问到,“当你遇到别人,跟他们提到你在中专上学,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时,有受访新中专生回答道:“他们不会有什么反应,因为这个是你自己选择的,也没有办法,如果说家里一些老顽固的话,他们认为高中很好的话,他们反应也就是很吃惊吧,也就感觉到你没有能力去考高中。”(X-c-6)由上可知,被定义为学业失败者的新中专生,不仅不愿主动就读中专,也很难得到父母、朋友及他人的认可。

2. 他们来自哪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瓦解下渴望融入城市的新市民子弟

从生源来看,除了传统的农家子弟生源外,随迁家庭的新市民子弟也成为重要的生源群体。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开始瓦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相当一批农村户籍的人来到城市打工,并留在了城市,成为新市民。然而,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不少随迁家庭的子女无法享受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只能进入中专就读。如有受访新中专生提到:“外地人在这里只能读职业类学校,不能读普通高中。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我们那个地方,人很多,学习压力很大,我没想过回老家读,所以就在这里读中专。”(X-b-7)

而且,对于没有本地户籍的学生,只能选择三年制中专或者中高职贯通项目,而无法选择中本贯通项目。对此,有受访新中专生提到:“我们不能去中本,中本只有本地人才能考,外地人只能考中高职贯通项目和中专,中专的话,还要自己去考大专,我们就索性来读中高职贯通项目。”(X-a-4)从受访新中专生父母的职业类型来看,新中专生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中下阶层,如售货员、快递员、外卖配送员、保安、工厂工人、环卫工人等。与社会中上阶层相比,新中专生群体拥有的家庭资本、社会资本相对更少,其选择也会受到自身经济条件的制约,他们自己也会考虑到上中专与上大学之间的成本差异。当被问及“是否比较过读中专和大学的成本”时,有受访者回答道:“如果读中高职

的话,和正常大学相比就差两年,就是一个时间成本,可以早点赚钱。高职阶段升到工商职业学院,一年大概几千块吧。现在因为我是随迁,又是农村户口,所以国家给你免学费的,相对来说比较划算的。”(X-b-1)虽然出身于社会中下阶层,但从对受访新中专生的访谈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努力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社会阶层的强烈渴望。

3. 他们去往何处:就业包分配体制瓦解下的“打工一族”

中专是时代的产物,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波动起伏,这在新中专生的职业发展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就业包分配体制的瓦解,中专生不再能拿到“铁饭碗”,其特有的光环逐渐消失殆尽,“打工一族”的身份逐渐凸显。与老中专生所处的年代相比,新中专生在劳动力市场中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比以往更加残酷,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进入了次要劳动力市场。随着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中专学历在人力资源市场中日益贬值。在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影响下,无论是普通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还是职业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如果无法实现后续的学历提升,中专生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都会受到限制。对新中专生而言,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毕业之后的第一选择逐渐从就业转变为升学。当被问到“中专毕业后你想做什么,升学还是找工作”时,几乎所有的受访新中专生都回答了“升学”,即通过进一步深造,拿到更高的学历。当被问到“有大学学历的人是否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收入”时,受访新中专生大部分提到,学历并非决定成功的唯一因素,能力也很重要。如有受访新中专生如此回答道:“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这要看你自身的能力。就像我爸爸他不是人事部的嘛,他有给别人面试,他还有跟我谈过就是说,很多人是大学毕业的,但是给他们面试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讲不出来,反而你要去问一个不是大学毕业的人,他就是个专科毕业的,你问他一些东西,他会懂。就是说,虽然你大学毕业了,但是你有没有能把学到的东西在实践中给用上。”(X-c-4)然而,当进一步追问“如果把职业教育学历和普通教育学历进行比较,你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时,受访新中专生普遍强调了学历对于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如有受访新中专生回答道:“术语的话就是专科文凭嘛,和本科文凭,就是一个学历的差距啊。然后就会看到二者的高低。如果你是一个专科毕业和一个本科大学毕业的去面试,面试官肯定是更加倾向于本科毕业的。有一些企业因为你不是本科,有些面试就直接淘汰掉。所以我觉得不要一毕业就去就业,我感觉还是要继续升学,才会有更多的机遇机会,得到好的工作,否则,连敲门砖都没有。”(X-b-8)可见,为了获得更多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大部分新中专生意识到了学历提升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提升学历赢得更多的竞争资本。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然而,与其重要地位所不匹配的是,职业教育吸引力在近年来发生急剧变化,甚至出现“污名化”的现象。然而,这种“污名化”现象并非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多从当下出发探讨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原因,而缺乏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且缺乏有理论依据的实证研究,导致相关分析结论难以超出就事论事的范畴。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系统探究老中专生、新中专生对其社会形象的理解,借助个体化理论视角,找到形塑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关键要素。

通过对老中专生回忆录文章的梳理和对新中专生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中专生社会形象的变迁是由中专生从“嵌入”到“脱嵌”的个体化进程带来的。具体而言,在招生来源方面,中专生的社

会形象从“精英教育体制下的学业佼佼者”逐步转变为“精英教育体制瓦解下的学业失败者”,生源质量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彼时,中专是一种典型的选拔性教育,生源可选择范围大,优质生源争先报考中专,竞争难度大,社会对于学生能够考上中专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而随着中专逐渐转变为兜底式教育,各地中专招生分数线不断下滑,竞争性色彩不断淡化,社会对于学生能够考上中专的评价也是急转直下。在家庭背景方面,中专生的社会形象从“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渴望‘跳出农门’的农家子弟”转变为“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瓦解下渴望融入城市的新市民子弟”,其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还是传统的农业型社会,而且实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在农村人口占主流的背景下,农家子弟成为中专生家庭背景的重要社会标签。而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不少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成为新市民群体,新市民子弟也开始成为中专生家庭背景的社会标签。从社会阶层来看,虽然其群体范围发生了扩大,但总体来看,就读中专的家庭仍主要来自社会中下阶层。在职业发展方面,中专生的社会形象从“就业包分配体制下的‘铁饭碗’获得者”逐渐转变为“就业包分配体制瓦解下的‘打工一族’”,其职业发展的落差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最初,中专对弱势社会阶层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农家子弟寄希望于通过接受中专教育,实现“鲤鱼跳农门”。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中专生包分配制度的废除,其社会光环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褪去,“打工一族”的身份逐渐凸显。而且,伴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中专学历的贬值效应日益凸显,未能实现学历提升的老中专生职业发展空间受到很大的局限。对此,笔者在了一项基于对中专生及其父母的深度访谈研究中亦有类似发现,表面上看,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来自升学,职业学校学生似乎都希望通过升学获得更高的文凭,而劳动力市场中潜在的职业发展前景才真正影响到他们的高等教育期望。^①新世纪以来,同样受限于学历劣势,新中专生大部分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甚至不再有资格报考具有较高声誉的国家企事业单位,中专生的社会形象危机由此进一步加剧。

通过对比分析,不难看出,以老中专为代表的中等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精英教育色彩。彼时,能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只有少部分绩优群体,中等职业教育不仅具有就业谋生的功能,而且具有阶层流动的功能,能够帮助农家子弟通过就业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从而步入以精英群体为主的社会中上阶层。而以新中专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则具有鲜明的大众教育色彩。从精英到大众的社会形象变迁,是导致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关键所在。如今,接受职业教育几乎不再具有分数门槛,职业教育的兜底特征愈发突出,几乎只剩下就业谋生的功能。在生源群体社会阶层未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却很难再帮助学生通过就业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由此,不难理解,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下降已经很难避免。

从对中专生社会形象变迁的分析不难看出,对职业教育吸引力起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是职业发展。如果要想让职业教育具备吸引力,关键在于提高这类教育形式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启示。中专生职业发展轨迹的没落,反映出体制转型的阵痛,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对中专教育发展轨迹带来重要影响。显然,如今已经无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中专生毕业包分配、拿到“铁饭碗”等注定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回忆。

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在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中专生在个体化进程中被迫“脱嵌”之后,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原因在于,他们的发展仍然依赖于社会制度的支持,包括公平的教育制度、平等的就业机会、优质的工作岗位等。个体化可以理解为个

^①T. Hao & M. Pilz, “Attractiveness of VET in China: A study on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Vol. 34, No. 4, 2021, pp. 472 - 487.

体从传统的,赖以获得安全感、稳定性与自我认同的旧机制(制度、约束关系)中脱离出来,重新嵌入新机制(制度、约束关系)的持续的动态过程。^①由于新旧机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新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中专生从传统体制中“脱嵌”出来,就意味着失去了稳定与保护,为个体发展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在看似简单的“脱嵌”与“再嵌”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也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下降埋下了伏笔。遗憾的是,在缺乏足够社会资本的情况下,中专生个体化发展未能实现从“脱嵌”到“再嵌”的成功转型,而是遭遇了一系列风险困境,未能有效嵌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急速下降。实际上,中国的个体化路径不同于西方社会,传统、现代、后现代交织在一起,社会转型与个体化同步发展,社会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个体化进程中制度再嵌入不足的存在在所难免。^②由此,在推动以中专生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学生个体化进程中,强化与个体化相匹配的制度建设就变得尤为重要。

(二) 研究建议

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以中专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承载了特殊的历史使命。在各行各业专业技术人才紧缺的年代,大批中专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时至当下,我们要思考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提高职业教育的适应性,重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帮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完成从“脱嵌”到“再嵌”的个体化转型。

一是改革单一以分数为取向的普职分流制度,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教育类型。现有普职分流制度存在的弊端是,以单一学业成绩为标准,高分学生就读普通高中,低分学生就读职业学校,造成中专教育的低层次形象。从老中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培养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同样需要优质生源的支撑。教育最大的规律是因材施教,在学业成绩之外,教育分流还需考虑到学生的兴趣与禀赋。如黄炎培所言,“苟社会分工制度一日不废,而人类天生才性一日不齐,职业指导虽永远存在可也。”^③因此,要通过开展广泛的生涯规划教育,帮助学生找到职业兴趣,了解自身禀赋优势,做出理性的教育选择,让学生在适合的教育道路上健康成长。

二是夯实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凸显职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技能优势。以家庭阶层背景为标志的家庭因素对个体的教育选择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职校学生社会身份的变化影响着家庭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判断,而个人最终选择何种教育类型,部分地取决于其家庭对各类资本的占有量。^④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专生的家庭背景在历史变迁中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仍然以社会中下层为主,该群体渴望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提升阶层地位的欲望尤其强烈。由此,中等职业教育要积极面向市场办学,设置具有一定稀缺性的专业,提升毕业生的综合职业能力,让其能够拥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获得更多社会流动的机会。

三是完善职业教育升学体系,健全技能型人才评价制度。职校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意味着这一群体是通过各种活动获得社会资源能力增加的,其受教育状况通过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地决定了他们职业发展的可能性。^⑤从中专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不断扩招的大趋势下,中专生的学历贬值效应日益凸显。在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中,中专学历已经很难帮助学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也很难获得足够的职业发展空间。因此,要通过中本贯通项目、职教高考制度等,为中职毕业生

^①范明林、董云芳:《从“脱嵌”到“再嵌”的张力及困境——个体化视角下的单亲贫困母亲生命故事分析》,《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

^②胡叠泉、黄健元:《“脱嵌”到“再嵌”——个体化对随迁家庭形成的作用机制》,《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10期。

^③黄炎培:《职业教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1页。

^④周正:《干预个体选择职业教育的家庭因素探析——社会分层的视角》,《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年第33期。

^⑤庄西真:《职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的社会学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8年第7期。

提供更多升学机会,弥补学历劣势。此外,还要打破传统的干部与工人二元管理体制,缩小白领从业者与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级差,健全以能力为取向的技能型人才评价制度,提升技能型人才的收入水平,改善技能型人才的工作环境、福利保障等。

(责任编辑:蒋永华)

From Embedding, Dis-embedding to Re-embedding: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the Declin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ppeal and Pathways to Its Reshaping

HAO Tiancong, WANG Weiping

Abstract: Enhancing the appe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decline in the appe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not an old issue but a new one. Draw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ization theory, and through text analysis of memoirs written by former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old cohort)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urrent students (new cohort),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social image of vocational students has shifted in parallel with their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a transition from “embeddedness” to “dis-embeddedness”. Specifically, vocational students have shifted from being “academic achievers under an elite educational system” to “academic failures in the collapse of the elite education system”, from “rural youths eager to ‘escape the farming life’ under the urban-rural dual management system” to “new urban citizens striving for inclusion in the city as the dual system dissolves”, and from “holders of secure, state-assigned jobs under the employment allocation system” to “member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wake of the system’s collapse”. Under the transition from a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to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s, as represented by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institutionally “re-embedded”.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declin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s appeal. To enhance the appe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reforms aligned with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vocational students must be strengthened. First, the single score-oriented general-vocational education tracking system must be reformed to guide students towards choosing educational pathways suited to their personal development. Second,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needs to be solidified to highlight the competitive skills of vocational graduates in the labor market. Thir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enrollment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skilled professionals needs to be improved.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appeal; individualization; embedding; dis-embedding; re-embedding

About the authors: HAO Tiancong, PhD in Educatio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WANG Weiping, PhD in Management, is Lecturer in Institute of China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